

李自成

姚雪垠 著

李自成

第一卷上册

姚雪垠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五卷，以写明末的农民战争为主，兼写中国内部明、清之间和清、顺之间的民族战争，刻画了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生活画面，以及各阶级、各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展开了色彩缤纷的历史画卷。

第一卷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冬天到次年夏天。当时农民战争处于低潮。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于明军包围，经过英勇战斗，全军复没，妻女俱失，突围出来时只剩下十八个人。但他立刻在商洛山中积极经营，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重整旗鼓，与突围到豫西的高夫人胜利会师，并推动张献忠重新起义，把农民革命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在这一卷中也写了明清的一次战争，以及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对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尖锐斗争。这次重印，稍加修改。最后一章是作者一九六三年写的，趁这次重印机会补上去。

前 言

《李自成》第一卷初版于一九六三年。现在趁第一卷修订重版的机会，我将写作和学习的一些问题向工农兵读者以及文艺界的同志们汇报。

一

解放以后，我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下，下定决心写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虽然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才能树起来“雄心壮志”，将写成这部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开始认真准备。

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主题思想不是产生于作者有了写作动念之后的凭空构思，而是产生于他对历史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只有经过对历史作了比较广泛和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理解历史问题的全貌、内容和本质，以及历史运动的规律，从而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变，写出来历史的经验教训，塑造好历史人物。解放前我之所以对写《李

自成》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做准备工作,不仅因为没有生活保证,而且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

伟大祖国的解放诞生了新的历史时代,给我这个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改造的条件,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机会。随着我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对接触过的历史资料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一旦初步形成了主题思想,它一方面可以继续丰富和深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在继续准备的工作上打主动仗,并且增长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我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倘若用我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写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要用艺术笔墨拥护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揭露什么,必须先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大破大立。单就写人物说,必须对李自成及其将领、士兵群众、包括孩儿兵、女兵和女将在内,怀着深厚感情,不然就没法塑造出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为他们写出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任何一个小说作者,他对自己所写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感动,不充满激情,他的笔墨不可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弦,唤起强烈共鸣。我在写《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迫使

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下写。这种与农民起义的大小英雄同呼吸，共脉搏，时常为他们痛洒激动之泪的感情是哪里来的？是解放后通过党给我的思想改造得来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溉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这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没有这，我不可能将历史化为小说艺术。

党所给我的艺术新生命，当然也包括使我开始懂得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就历史题材说，首先要解决“古为今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学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服务。任何阶级都有各自的“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历史著作和文学、艺术等不同手段反映出来。倘若不是在解放后通过思想改造，不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明方向，而是继续按照我前半生的写作道路走，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去巩固历史题材这一角阵地。这不是我的自觉目的，而是事实的必然。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仅给我一个新的艺术生命，而且更难忘的是，在我最迫切需要的时候都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自关怀和支持。没有他老人家不止一次的关怀和支持，纵然在一九六三年已经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以下各卷的写作计划肯定没有完成的可能。

《李自成》是一部包括五卷的长篇小说，写成后可能有三百万字，人物众多，结构庞大。我已经进入老年，许多热

情的读者和同志都担心我未必能完成写作计划。许多年来我没有假日,没有节日,不分冬夏,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开始工作,每日工作常在十个小时以上。许多年中,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我都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明末历史问题和坚持写《李自成》的工作。通过长期实践,我替自己总结了四句座右铭:“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许多年中,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我写《李自成》给予了关怀和支持。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夏秋之间,由于“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逆流的严重干扰,简直不给我机会往下写了,可以想象我的痛苦有多么深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一面向上级党领导“诉苦”,一面向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老人家再一次给我支持。

一九七五年十月间,我为着能够顺利地写下去,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李自成》第二卷已经在一年前完成了初稿,也汇报了我的年龄,我的写作计划和愿望,以及以后工作的艰巨。我在信的结尾说:“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六十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李自成》,争取在七十五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

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

由于伟大领袖和导师看了我的信以后给予我关怀和支持，我于七五年十二月来到北京，集中精力，抓紧时间，为第二卷稿子的出版进行推敲修改。然而竟然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逝世前将书出版，呈送到他老人家的面前。这是我将终生都感到无穷遗憾和痛心的事。

倘若“四人帮”不被打倒，以江青为首的一伙文艺界恶霸流氓继续篡窃文权，纵然有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李自成》第二卷也不会顺利出版。稿子清样送审，他们必然会百般挑剔，要求合乎他们的口味，即要求能够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否则不但休想出版，还得挨棍子。纵然可以经过坎坷的道路将作品出版，但因为我的作品不合他们的要求，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的看法，艺术创作的道路，等等方面，都同他们唱的是反调，加之我这个人不合他们的要求，尤其我是背着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得到主席支持的，他们岂能不寻找不成理由的借口打棍子？第一卷修订本和第二卷合起来有一百三十万字，按照他们惯用的办法，从中找出一段或几句话，肆意歪曲，引伸傅会，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打棍子极其容易，又不许半句申辩。这一群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家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势，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践踏无余。

第二卷发排之前，我做了些枉费心血的劳动，即如何避

免一些字句会被“四人帮”一伙引伸曲解，胡乱找到借口，等待一旦形势好转，然后补上。当时我也准备了最后一道防线：倘若清样送审时“四人帮”指出来应该加上李自成反孔的内容，或要我如何接受所谓“三突出”的“创作经验”，指出主要英雄人物李自成和反面人物崇祯皇帝等应该如何写，我都决不接受。倘不能够据理力争，便只好拖下去暂不出版。

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稿都加了一些作者的分析议论。当第二卷清样请工人同志们开座谈会讨论时，“四人帮”刚被打倒，工人同志们笑着指出：“你用作者身分作的那些议论，是害怕‘四人帮’打棍子啊，现在就不必要了。”是的，确实是害怕我的写作意图被“四人帮”一伙随心曲解，不明不白地挨了棍子。好则我在增加分析议论时尽可能不破坏细节的艺术完整，更不以议论代替艺术。有些影响艺术完整的地方，在付印前删去。当然，因为第二卷部头较大，难免留有蛇足，在付印前注意不够，仍然存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国家，为各条战线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开辟了灿烂前途。就我来说，搬去了头上的一块大石。为此我欢喜欲狂，的确是平生少有的极大快事，从心眼儿里歌颂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不朽功勋。我拭目望着以毛泽东思想灌溉的文艺花园中必然会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争奇斗艳。

二

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在深入和跳出的关系上，深入是前题，是基础。不能做到深入历史，就谈不上跳出历史。不能相当准确地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事变和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不可能进行艺术构思，再现历史生活，反映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重大问题的真正意义，也不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表现出他们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以下谈论的问题，虽是举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为例，但涉及的方面不少。有些是属于和同志们探讨，也是向读者汇报我所做的某些探索，请求读者和同志们指正。但有些问题，例如李自成反孔问题，则是对“四人帮”进行批判，为肃清其流毒尽我的一点微力。

（一）关于李自成

李自成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我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时，在性格和事迹方面基本上根据他本人原型，但也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为要使李自成为小说一开始就成为崇祯皇帝的主要对手，我将李自成在

崇祯十三年冬天以前的重要性作些夸张。围绕着李自成的革命经历，我首先对于每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做到深入历史，心中有数，然后在写作小说时跳出历史，努力争取正确地处理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关系。

关于跳出历史而利用传说，可以举第一卷中所写的潼关南原大战为例。关于这次战争的纪载，较早的史料出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卷六，为冯苏的《见闻随笔》卷上所承袭。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亦采取此说，但有异词。《明史》采入《曹变蛟传》中。这一说法在后来颇为流行，一直影响我国现代史学界有关李自成的一些著作。根据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次战争。但在写小说时候，我从完成小说的使命着眼，采用了这个传说，以便使李自成和他周围的英雄人物在小说中一出场就处于武装斗争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中，通过一次全军覆没的严酷考验刻画他们的英雄形象。接着写李自成在革命低潮中，在全军覆没之后，不是灰心丧气，动摇观望，而是以百折不挠精神，惨淡经营，力图恢复，用一切办法推动新的革命高潮。一部长篇小说有主题，副主题，而每一卷也不妨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上边所说的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心和百折不挠精神，贯穿在第一卷中。采用潼关南原大战的传说就是为这一卷的主题思想服务。

采用传说和虚构的情节，必须是对历史作了科学研究之后，而且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这样的情节在历史上虽非

实有的，却是可能的，而且通过传说和虚构的情节能够更集中、概括和生动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形势；第二，在艺术处理方面必须严格遵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总之，现实主义艺术从来不排除虚构和传说，而只不允许使用歪曲历史的虚构和传说。对于虚构的情节和传说故事，必须做到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相结合，以便描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深刻而生动地反映历史运动的实质和规律。故事情节和艺术细节的真实性，是指故事和细节必须是在当时的历史生活条件是可能产生的，合乎情理的。任何情节倘若放在当时历史生活条件下经不住推敲，它的艺术效果就会减弱或者完全丧失，甚至引起相反的效果。

从前一个原则出发，我敢于放开手写潼关南原大战。从历史的真实看，崇祯九年七月间前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经过一段斗争，李自成被推为闯王。但一则他在当时没有足够的威望统率高迎祥的旧部，二则官军的压力还很强大，所以在不到两年的奋战中，原属高迎祥的各队首领或死或降或散。到崇祯十一年四月间，李自成只剩下大约一千三百人，被洪承畴亲自督率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和王洪，以及副将马科和贺人龙等围堵穷追。李自成将残部分为两支，自己率领三百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在陇东南的大山中日夜奔走，迂回曲折，未被左光先追上，逃到汉中府境内。崇祯十一年前后，在陕西和中原地区的农民战争处于低潮，许多首领有的死了，有的投降了，有的伪降了。李自成确

实陷于孤军作战，几乎被消灭。只是他几乎被消灭的地点不在潼关附近，而战争的规模也不象所传潼关南原之战那么大。以后一个原则说，我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比较逼真地写出了潼关附近的地理形势、三百多年前的大战情况、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做到合情合理、经得起推敲。我也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但只是将这一艺术方法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补充，而不是基本。

我经过深入历史研究之后而断然摒弃了流行的传说，可以举关于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冬天进入河南之前曾被围于“鱼复诸山”的说法为例。这个传说比潼关南原大战的传说还要流行。经过《明史》的《流贼传》整理采用，故事的前后脉络清楚，首尾完整。因其几乎成了定论，故我国现代有关李自成的著作中也多采用。其实，这个故事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毫无事实根据。李自成在驰入河南之前实际是潜伏在汉水以南的鄢阳山中。那里从崇祯十三年夏天到冬天是军事真空地带，利于李自成息马深山，等待时机到来。在《李自成》第二卷中处理这个问题，我采用了自己研究的结论，抛弃了流行甚广的说法。我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第一，凡是需要依照历史的真实写出小说情节的，我都依照历史的真实；第二，鱼复山的故事胡说什么李自成的将士们纷纷出降，刘宗敏也想投降，李自成不止一次想自杀都被养子李双喜劝阻了。最后李自成没有别的办法，同刘宗敏步入一座野庙中打卦，说明倘若打卦不吉利，情愿叫刘宗敏割

下他的头去向官军投降。接着说刘宗敏同意这个办法，幸而连打三个吉卦，刘宗敏才发誓今后要死心塌地跟随自成，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妻子，军中将士也纷纷杀妻子，随着闯王突围。这个伪造的故事恶毒地歪曲和诬蔑了李自成及其将士，不但非抛弃不可，而且还要在第三卷中通过一个细节对这个历史谣言作出揭露和批判。

关于采用真假难说的传说，可以举关于李自成到谷城会见张献忠的故事为例。这件事，吴伟业是作为一个未必可信的传说，用双行小字夹注在《绥寇纪略》的正文里边，从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我根据那几句夹注写出李自成去谷城的一件“大事”，改造了传说的内容。我这样做，有利于表现李自成在全军覆没后如何想办法推动大局，同时塑造张献忠这个人物，又写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高低之差，还写出来当时历史形势的一些真实情况。同时我考虑：明末的农民战争极其波澜壮阔，错综复杂，不能孤立地写李自成。我写大西军作为大顺军的陪衬，写张献忠作为李自成的陪衬，在反映当时历史面貌上是必要的。

在写李自成这个古代农民英雄时，我努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一些较为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得出我自己的认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敢于坚持，在受到“四人帮”所提倡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强大压力时我有决心顶住。我的勇气来自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也来自自我对于祖国历史有基本了解以及我对史学和文艺的双重责任心。

现在我挑出三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向读者汇报我的粗浅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李自成是否有帝王思想。第一卷出版之后，曾有同志说《李自成》是一棵大毒草，其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说我写李自成有帝王思想，歪曲了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他们说，农民革命是反封建的，决不会有帝王思想；说农民革命成功后要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而不是封建政权。这论调曾在史学界引起讨论，未得结果；虽倡自少数人之口，却有一定代表性；因其貌似保卫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故也有一定的迷惑力量。对待这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尖锐的指责，我是怎样考虑的呢？

我首先从一般的历史事实出发。从秦朝末年到清朝末年，我细数下来，还没有看见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能摆脱帝王思想或皇权思想。他们或者是希望自己称王称帝，或者是拥护别人称王称帝，其下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一般的历史情况，早已成了常识。抛开历史常识去空谈历史是毫无意义的。

再看李自成本人所走的道路。李自成原是高迎祥的部将，继迎祥为闯王，到崇祯十六年春天建立正式称号为新顺王，次年正月改称大顺皇帝。这是李自成本身的历史事实。又《延绥镇志》记李自成潜伏“商洛山中，昼则射猎，夜则读书，且观乾象，云：‘过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以勉慰群贼。高一功笑之。曰：‘西汉沛公，百战百败而得天下，汝知之乎？’”（引自乾隆年修《商州志》卷十四）我看这记载也大致

可信。我们谈论历史，只有权对历史事实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无权不承认历史事实。

最后从理论上。凡是真正的农民起义（不仅仅停留于拉杆子，作草寇），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考虑到通过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即推倒旧江山，建立新江山，简单的说法是改朝换代。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领袖有帝王思想不能说明他的落后，而是说明他反对旧皇权的坚决和鲜明立场。关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不是依照历史空谈家的主观愿望，而是依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即决定于经济基础。在明朝末年，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仅仅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我们不应该要求李自成和张献忠摆脱帝王思想，建立近代的民主共和国。至于说农民政权，那只是某些同志的善良奇想。不应该把某次农民起义时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或不能成功的试验当作脱离于封建历史之外的政权实体。事实上，人类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只有奴隶制政权、封建制政权和资本主义制政权，而没有另外存在过非封建性的农民政权。有人劝我不写农民英雄原来有帝王思想，而只写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之后使他们滋长了帝王思想。我认为，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之后，当然要以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政治野心去影响农民军，但是这种外在的影响只是外因，即一个辅助条件，而不是农民英雄产生帝王思想的根据，不能代替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帝王思想也就是皇权思想。马列主义的大师们对这个

问题怎么看的呢？马克思在论到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时写道：“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法兰西内战》）就是说，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是因为他们把拿破仑看做是好皇帝。可见到了近代，十九世纪初叶的法国农民的皇权思想也很严重。斯大林说：“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第二个问题是李自成是否有天命观。有人说，农民革命英雄不应该有天命观，甚至也不要写他们有迷信思想。我明白这是好的愿望，也是一个善意的劝告，怕我歪曲了农民英雄形象。但是，我的原则是不写超时代的空想英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劳动人民虽然创造了灿烂文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也由于科学文化的不发达，没法摆脱愚昧和落后。在封建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宿命论思想，笼罩着各个方面，而天命观是其一。中国的“革命”一词起源于上古奴隶制时代，意即新兴王朝上膺天命，革除旧朝的天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旧政权利利用天命观欺骗和束缚人民思想，镇压革命，而革命人民也利用天命观鼓动革命。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都要做“真命天子”，代代如此。恩格斯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